

周作人：

中国现代性的

另类选择

[英] 苏文瑜 著
康 凌 译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文学创作和思想活动，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从周作人的文学创作和思想活动出发，探讨了中国现代性的另类选择。本书共分五章，第一章介绍周作人的生平，第二章探讨周作人的文学创作，第三章探讨周作人的思想活动，第四章探讨周作人的文学创作与思想活动的关系，第五章探讨周作人的文学创作与思想活动的意义。

周作人：中国现代性的 另类选择

苏文瑜(Susan Daruvala) 著

康 凌 译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作人:中国现代性的另类选择/[英]苏文瑜著;康凌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4
书名原文:Zhou Zuoren and an Alternative Chinese Response to Modernity
ISBN 978-7-309-09241-7

I. 周… II. ①苏…②康… III. 周作人(1885~1967)-人物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3026号

ZHOU ZUOREN AND AN ALTERNATIVE CHINESE RESPONSE TO MODERNITY

by Susan Daruvala

Copyright © 2000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through Bardon – 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year)

by Fudan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9-2010-149

周作人:中国现代性的另类选择

[英]苏文瑜 著

康凌 译

责任编辑/余璐璐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875 字数 262千

2013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09241-7/K·383

定价: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这本书献给我的母亲
E. D. Daruvala,
她教会我独立的价值；
同时纪念我的父亲
Fali R. Daruvala

致 谢

这项研究始于我 1989 年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写作。我首先要感谢的是李欧梵老师，他始终给予我鼓励和启发。我深深地感激他多年以来慷慨而坚定的支持。同样要感谢的是我学位委员会的另两位成员，芮效卫 (David T. Roy) 与余国藩 (Antony C. Yu)，感谢他们慷慨、专业的指导，以及出色的教学与研究榜样。没有这三位老师，这本书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在写作这本书的十年间，我得到了许多其他学术与思想上的教益。贺麦晓 (Michel Hockx) 在很多方面帮助了我，最重要的是他详尽地评论了这本书的初稿，这对修订助益极大。Francesca Orsini、卜立德 (David Pollard)、汤若杰 (Roger Thompson) 和王德威也完整阅读了初稿，并给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批评与建议。我感谢王德威让我知道他对这本书的支持，也感谢卜立德对周作人的开拓性研究。与 Lawrence 和 Pushpa Surendra 的谈话促使我精炼了在第一章中的论述。我诚挚地感谢他们的友谊，并深深珍藏。

我要特别感谢杨义寄送给我完成研究所需的书籍。同样谢谢米德 (Rana Mitter)、韩文敏、周绍明 (Joe McDermott)、方德万 (Hans van de Ven)、赵毅衡和 Cathrin Zondler 帮我搜集材料，以

及柯思仁(Sy Ren Quah)在字表方面提供的帮助。这一博士论文的研究与写作有很大一部分完成于台湾,李淑媛在汉诗方面助我一臂之力,而林素芬则帮我查找书籍与材料。这本书的正式写作开始于我1995年在剑桥大学东方研究院任教之后,在那里我幸运地遇到了许多杰出的同事。我要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同样谢谢我的学生在课堂里给我的支持,以及教授他们所带来的快乐和挑战。自去年成为三一学院的院士之后,各种研究便利加快了这本书的写作。

在进入芝加哥大学之前,我的谢意要远远地追溯到我在利兹大学——在那里读本科时我学习了中文——时的老师们,特别是Don Rimmington,我离开之后也和他保持着联系。我还要感谢施拉姆(Stuart Schram)和John Dolfin,前者在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的教学发人深省,而后者则接收我在香港的大学服务中心进行独立研究,尽管那时我还没有在任何机构任职。

还要感谢的是芝加哥大学批准了一笔来自台湾大学的学位论文写作资助。同样谢谢那些使我能够在讨论班或研讨会上提交材料的人们:利大英(Gregory Lee),他于1989年在芝加哥大学组织了有关中国写作的研讨会、1994年在利兹举办了英国汉学学会大会、同年于布拉格举行欧洲汉学学会大会;方德万和毕可思(Robert Bickers),于1996年在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组织了中国历史研究会。

哈佛大学亚洲中心的约翰·茨默(John Ziemer)极为严格、耐心,并对这一领域非常在行,他声誉卓著,是每一位学者所期望的编辑。他专业中肯的建议与一丝不苟的编辑大大改良了这本书。不必说,我为书中的任何错误与缺陷负全责。

最后,我希望感谢我的家人与朋友。作为朋友,Roman和

Joasia Rollnick 给予我特别的照顾与温暖,尽管有时写作的要求使我难以报偿他们。我的公婆,Sidney 和 Lois Robbins,给我不变的关爱与经年的支持。我的丈夫,Neal E. Robbins,持续不断地给我热情的鼓励与出色的建议。没有他我无法完成这本书。我们的孩子,Joel 与 Anna,与这本书一起成长,他们的幽默、乐观给予我巨大的动力。最后,如果没有我的母亲,E. D. Daruvala,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取得如今这般的安乐。尽管她已年届八十,在我长期的紧张写作时,她依旧在家中分担着照料孩子以及操持家庭的义务,并以她的才思与智慧,始终让我们不断奋进。

S. D.

中译本序

因为对寻根派作家的兴趣，我走向了周作人。与他们的前辈们相比，寻根派的作品指向了一条通往更为自由而丰沛的文学想象的道路。他们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对地方性的关注，似乎是在批判国家话语在“五四”时期以降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宰制地位。学者李陀曾为寻根派发掘出一条回溯至京派作家的文学谱系。而他们的导师正是周作人。我始终感激李欧梵教授和余国藩教授，是他们建议我将注意力转向周作人。在我刚开始阅读周氏的作品时，我对他一无所知，更不知道自己将会发现什么。我最早阅读的作品是《自己的园地》和《谈龙集》，它们极富教益，于是，我开始对博士论文产生了信心——本书正脱胎于二十多年前的这篇论文。周作人极其重视个体作出独立判断的能力与责任，并试图在他自己的文学活动中躬行践履。这本身就使他成为一位非常有吸引力的作家。

当我试图在“五四”的背景下理解周作人时，我发现自己不断地回到一些更大的问题：民族国家、现代性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现代性如何与西方相关联？以及西方与非西方世界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难题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尤富争议。在论文写作期间，我警惕着自己落入陷阱：发现自己愿意发现的东西，或者在某些方面被偏见、意识形态（自己的或他人的）、时髦的理论所误

导。但是，当我试图去理解周作人的文学实践与美学如何与他关于个人的理念发生关联时，我发现自己被引入了对漫长而持久的中国文学历史，尤其是激进的晚明思想家的世界的研究。借由对这些思想家的研习，周作人的作品为那些宏大、困难的问题——现代世界中的个人如何与“传统”及民族国家发生关联——提供了答案。由于这些问题仍旧极富当下性，因此，尽管清醒地意识到这本书的缺漏与局限，我依旧希望能将周作人工作中的这一方面推向前台。

在试图理解现代性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我将现代性区分为“一级现代性”和“次级现代性”。在次级现代性中，民族国家扮演了核心角色，而一级现代性则更为模糊。在书中，我将其描述为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一种效应，始于——比方说——16世纪墨西哥的白银经由西属菲律宾开始在东亚经济中发挥作用的那一刻。在亚洲，正如在世界其他地方，增长的贸易、经济某些部门的商业化，以及城市休闲文化的发展都是它的后果。

在这本书初版后的十年间，学术的高速发展令人振奋，也使我得以深化自己的理解，并希望为本书的读者提供两点想法。第一，一级现代性正相当于历史学家们今日所描述的一种早期全球化形式。当全球化最初在1990年代成为一个核心概念时，社会科学家认为全球化进程始于1970年代。而到了1990年代末，对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反抗已然出现，对全球化的负面效应的焦虑也日渐增长。显然，为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学者们需要检视全球化的历史维度。只有通过观察其历史根源，我们才能回答这一核心问题：全球化是否是一个全新的现象。上面给出的说法来自于霍普金斯(A. G. Hopkins)在其所编《世界历史中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兰登书屋, 2002年)一书中的解释, 这本书是在剑桥举行的一次会议的产物。在他的导论中, 霍普金斯警告道, 将全球化视为一种当下趋势的延续是危险的。事

实上,会议表明,在历史中,全球化是一个未完成的进程,它采取了多种互相交叠与并存的形式。霍普金斯和他的历史学同事们将其归纳为:i) 古典全球化,由如唐朝和拜占庭这样的庞大帝国推动;ii) 1600—1800年间的初始全球化,期间国家更趋强大,金融与制造业增长,贸易以及货物和人口的流动持续;iii) 1800—1950年间的现代全球化,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与工业化的传播;iv) 从1950年至今的后殖民全球化。

由此,一级现代性对应于“初始全球化”阶段,而次级现代性则对应于“现代全球化”。我认为这阐明了一点,即周作人的另类回应针对的是被民族国家——它建立于现代全球化阶段——所宰制的现代性,同时,这也间接地证实了他的理念:我们有可能在晚明找到现代主体的根基。

我希望提供给读者的第二个想法与第一个相联,并且与文学有更直接的关系。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的书籍与书籍市场的历史被投以大量的关注。现在我们认识到,从16世纪中叶起,长三角下游出现了一次出版高潮,印刷书籍在市场上的流通变得重要起来。法国文学史家阿兰·维亚拉曾提出过一个相当有趣的观点,它同样适用于中国文学研究。维亚拉在《文学场域理论与第一现代性状况》^①中指出,所有的现代性都涉及知识与艺术借印刷业之力而得以扩大传播,同时,商业市场的创生是作家得以自主的一个先决条件,因为这意味着作家不再被迫依赖于某个赞助人。文学场域的概念来自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并且为许多中国现代文学学者所有效使用。然而,布尔迪厄认为文学场域仅仅出现在19世纪。而维埃拉却将法国文学场域带回了他所谓17世纪

^① 阿兰·维亚拉(Alain Viala):《文学场域理论与第一现代性状况》(*The Theory of the Literary Field and the Situation of the First Modernity*),《段落》(*Paragraph*)第29卷,第1期(2006年3月),第80—93页。

的早期现代性。他指出，通过理解这两个时段之间如何发生关联，我们得以开始理解价值是如何被建构的。

对我而言，他的论述对中国文学研究极为重要，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出版业于16世纪中叶起开始兴盛，与此同时，许多重要的美学与哲学概念相继出现。这一洞见使我们有可能回到晚明并利用所有当时以来的资源，这或许有助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美学中的价值。这也表明周作人是一位多么富有预见性的思想家。

在结束这篇短序之前，我首先要谢谢姜丰，是她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推荐了这本书。我感谢她对这本书的信心以及她的善良、温情与友谊。同时，我必须向张业松教授表达我最深切的感激，这本书的翻译计划在他复旦大学的课程中得以实现。去年春天，我有幸在复旦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在那里，我见到了张教授和他的许多学生。对于他在课堂上运用的翻译与文本细读的方法，我深感钦佩。我在复旦遇到的学生中包括了康凌，我非常惊讶地获知，康凌——他当时还是一位本科生——承担了翻译全书的任务，并且，当我在上海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全部五章的翻译。我阅读了译文之后，非常高兴地发现这本书被交付给了一位可靠的译者：译文的准确与熟练，以及译者的智慧与敏锐都使我感到惊奇。我们共同解决的个别错误常常源自英文原文的模糊与疏忽。我无法给予他相应的称誉，也无法向他在容忍我的拖沓时的耐心，以及整个工作中的付出道尽我的谢意。

同时，我也要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与员工承担了这项计划，以及他们的专业与善意。

苏文瑜

(Susan Daruvala)

2011年3月

目 录

第一章 现代性以及和过去的断裂	001
民族主义与现代性	019
鲁迅：典范性“五四”知识分子	046
周作人对于现代性的另类回应	053
与“五四”话语的断裂及嗣后	069
第二章 文化建构	076
复古与革命：章炳麟的遗产	083
看待时间与文化的两种方法：鲁迅与周作人	095
人类学，神话学，和国民感情生活	108
日本对于地方的建构	116
过去的在场	125
文化与“落水”	135
第三章 地方与自我的美学	148
文学与不可言说	158
复古主义与明末逆传统	174
“趣味”：一种地方与物质文化的诗学	182



“本色”：个人整全性以及与传统的关系	199
第四章 周作人的人道主义,自我以及文章体裁	220
散文之辩	220
周作人的反例外论	255
“儒家之意与西方知识”	263
竞争性的自我模式	277
第五章 民族建构	283
民族主义修辞术	283
民众,语言,阶级,地方性	296
时间以及视觉与嗅觉的美学	306
结论	318
引用文献	338

· 第一章 ·

现代性以及过去的断裂

这是一项关于中国现代作家周作人(1885—1967)以及对于民族主义和现代性的多样回应的研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重要关头,周作人是重要的早期建设者,“五四”运动设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后来的发展方向^①。周作人代表了一种人道主义的思想路

^① 为这一运动断代是一件稍显困难的事。这一运动得名于1919年5月4日这一日期,这天北京的学生示威反对政府接受日本羞辱性的要求。示威爆发的背景是北大师生中的激烈骚动,他们呼吁一次思想革命来使得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得以现代化。示威标志着其转为全国范围内的爱国社会运动。这一运动常常被视为白话现代中国文学的诞生,但更为准确的说法是,它标志着一整批的激进文学实践和尝试的登场——它们至少自19世纪末起就已经开始酝酿。我选择1917年为新文化运动的起点,当时,陈独秀在北京创办了激进刊物《新青年》。用胡适的话来讲,到1923年,“讨论的时期”已经过了,“创造时期”应当开始。参杜博尼(McDougall):《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的推介》(*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into Modern China*),Tokyo: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1971年,第6页。然而,“五四”文学可以被宽泛地视为出版于1917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间的“新文学”,甚或直到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它代表了那些作家们辩论已久的观点的高峰。参周策纵(Chow Tse-tzung):《五四运动》(*The May Fourth Movement*),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年;舒衡哲(Schwarz):《中国启蒙运动》(*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年;梅谷(Goldman):《“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a*),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年;以及刘禾(Lydia Liu):《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年。

径，它致力于界定一种理想的生活。作为成立于1920年的文学研究会的奠基人，他首先催生了培育人道主义价值的文学^①。然而两年后，他放弃了那种文学能够在改良个人思想以至于在拯救民族中扮演部分角色的主张。19世纪晚期以降，对于民族未来的焦虑广为中国知识分子所分享（无论他们属于哪种党派），这种焦虑支持着所有关于现代性的讨论。“五四”运动放大了这一趋势。但是现在，对于周作人而言，成为一位独立作家的重要性大于来自民族的需要，这一理念将会产生重要的后果。

周作人促使小品文，而非现实主义小说或诗歌，成为最适于表达作者个性的形式。他早先被认为是当时最重要的散文文体家，并在1945年之前有规律地出版自己的文集。虽然他始终是个人的忠实捍卫者，但其潜在设想却在根本上与同时代的许多人大相径庭。其中包括他的兄长，以笔名鲁迅为人所知的周树人（1881—1936）（他们的三弟周建人[1889—1984]受训成为一名生物学家，1947年翻译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并在1949年之后担任过一些重要的政府职务）。作为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杰出先驱，鲁迅最终因其对民族与文化危机的深切体验而信奉了马克思主义，并在1940年被毛泽东捧至文化偶像的高度^②。尽管学者们稍后揭去了其神化外衣，但鲁迅依旧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典范人物。

在写作生涯的早期，周作人就明显地忠于一种大体上基于儒学的价值观。同时，他超然于1930年代日益增长的政治危机以及

① 参贺麦晓(Hockx)：《文学研究会》(*The Literary Association*)，China Quarterly, no. 153 (March 1998)，第49—81页。

②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第2卷，第372页。参李欧梵(Lee)在《铁屋中的呐喊》(*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中的讨论，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年，第133—191页。

对逼近的中日战争的担忧,这些似乎显得他滞后于时代的步伐。但最主要的还是他在1939年后的“落水”行为持续地困扰着对于他的评价。然而,本书并不试图解释他“落水”的原因,无论是作为其论点的逻辑终点,还是作为其结局。因为这将使我们囿于目的论的叙事之中,从而阻止我们恰当地理解周作人的工作。在此类叙事中,一位作家的传记、他的文学作品和中国的民族历史以这样一种方式缠绕在一起:其中,前两者必然依照第三者来加以评判。一直到90年代,对于被其典雅而博学的风格所吸引的中国与西方的学者,周作人是一个与历史的步伐脱节的落伍人物,一个最终成为叛徒的自命的儒家人道主义者。1980年代中期,试图从史学中复原“五四”遗产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将周作人尊为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提倡者^①。关于周作人的传记信息可以很容易地在别处得到,不过方便起见,我将简要地概述一下周作人的生平^②。

周作人生于浙江绍兴县的一个乡绅家庭,1893年他8岁时,身为高级官员的祖父被指控舞弊,这使得家庭的命运走向衰败。周作人从小接受传统教育,但在1901年跟随鲁迅的足迹进入公费的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在那里,英语是课程的重要部分。毕业时,他获得了政府的奖学金以留学日本,1906年于东京和鲁迅会合。在那里,除学习日文之外,周作人涉足了鲁迅的文学事业,并学习了欧洲文学和古典希腊语。他广泛地阅读英语作品,奠定了对于

① 最早这么做的是钱理群和舒芜。

② 周作人信息的最为详尽的来源是张菊香编的年谱。参钱理群:《凡人的悲哀》,台北:业强出版社,1991年;沃尔夫(Wolff):《周作人》,New York: Twayne,1971年;黄乔生:《度尽劫波》,它是对周氏三兄弟的传记体研究,北京:群众出版社,1998年。



人类学和神话学的长达一生的兴趣。

1909年，周作人娶了一名叫羽太信子(1887—1962)的日本女子。同年鲁迅回到中国，周作人将其精力转移到日本文学的阅读中。1911年秋，周作人携夫人回到绍兴。1912年至1917年，他于绍兴受聘成为一所学校的督学，后又任英语教师，期间发表了一些翻译作品和介绍外国文学的短文。1917年4月，在当时于北京的教育部工作的鲁迅的推荐下，周作人搬到了首都。他卷入“五四”新文化运动及与之决裂将在本章稍后予以讨论。1923年7月，由于一些从未公之于众的原因，周作人与鲁迅忽然反目成仇，鲁迅搬出了他们共同生活的住宅^①。自此以后，他们似乎中断了私人之间的联系，尽管1924年11月，他们共同主办了《语丝》杂志。1926年3月的动乱——其中，军阀段祺瑞(1865—1936)的部队屠杀了50名学生——之后，兄弟二人均被列入了政府的黑名单，同时，鲁迅离开了北京。与鲁迅1927年后停止教学并专事写作不同，周作人同时操持着文学与学术两项事业。

在这些事件之后，周作人的文章集中于他的历史与文学知识，而不直接接触及公共事件。1930年，他创办了一份名为《骆驼草》的短命杂志，宣称不谈政治，只谈文艺、思想、古董与“闲话”。他出版了多种杂志，并将主题相关的文章结集再版，这使他拥有了一个更为广泛与持久的读者群。1980年代以来，周作人日益被视为以“京派”为名的文学团体的关键人物，这一团体包括了沈从文

^① 在对于这一决裂的众多猜测中，大多数人将责任归咎于周作人的夫人，参钱理群：《凡人的悲哀》，第42—51页。由于钱理群的说法，其他学者推测反目的原因是由于羽太信子，鲁迅试图开始或继续与她的爱情。参李劫：《作为唐·吉诃德的鲁迅和作为哈姆雷特的周作人》，《中国研究月刊》1996年9月，第20—31页。